

2021年1-4月

# 彼得報

共同對抗不公不義



平民遭受武裝衝突波及  
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  
武裝衝突

讓我們呼吸！  
越南政府的網路審查與  
科技巨頭的共謀

承辦世界盃的承諾  
卡達應改善其移工政策

AMNESTY  
INTERNATIONAL



# 彼得報

一年三期報導人權現況，鼓舞大眾共同對抗不公不義。

## 聯絡我們



[Amnesty.tw](http://Amnesty.tw)



[Info@Amnesty.tw](mailto:Info@Amnesty.tw)



+886 (2) 2503-9301

## 採取行動



[Amnesty.tw/take-action](http://Amnesty.tw/take-action)

## 追蹤我們



[Amnestytw](https://twitter.com/Amnestytw)



[AmnestyTaiwan](https://www.instagram.com/AmnestyTaiw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https://www.youtube.com/AmnestyInternationalTaiwan)



[Facebook.com/AmnestyTaiwan](https://www.facebook.com/AmnestyTaiwan)  
或用手機掃描下方QR Code



封面圖片：  
卡達移工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版權所有，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出版。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019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發行所／105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36號7樓

# 本期目錄

## 專題報導

- 8 平民遭受武裝衝突波及  
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武裝衝突
- 12 讓我們呼吸！  
越南政府的網路審查與科技巨頭的共謀
- 16 承辦世界盃的承諾  
卡達應改善其移工政策
- 20 集會自由權利蒙上陰影  
智利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



## 其他內容

- 4 國際特赦組織全球動態
- 6 人權日誌與編輯手記
- 25 認識國際特赦組織的行動者



# 國際特赦組織 全球動態



## 2 新疆維吾爾父母與孩子失聯 承受分離之苦

國際特赦組織最新調查指出，中國新疆維吾爾家庭的孩子被迫進入政府經營的「育幼院」，流亡海外的家人承受分離之苦。2017年至今，估計至少100萬人遭恣意拘留於新疆所謂的「教育轉化」或「職業培訓」中心，遭受種種酷刑和無人道對待，包含政治教育灌輸以及強制文化同化。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中國政府讓聯合國人權專家、獨立研究員及記者，全面和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針對該區發生的情況進行調查。



## 3 緬甸軍方面臨壓力 鋼鐵企業切斷往來

2021年4月16日，南韓鋼鐵業龍頭浦項鋼鐵(POSCO)宣布將終止子公司與緬甸軍方企業「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的鋼產業合作，是對緬甸軍方一大打擊。國際特赦組織曾於2020年9月發布軍武企業報告，指出許多企業夥伴向緬甸軍事單位提供財務協助。2021年3月24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要求企業與緬甸國防軍切斷往來，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呼籲安理會應跟上腳步，進一步採取行動。



## 4 新香港反對派人士因示威入獄： 違反國際法

4月16日，有10位香港民主派人士遭當局以《公安條例》為依據起訴，判定組織及參與2019年8月18日和31日兩場「未經批准」之示威活動，並判處8至18個月有期徒刑。該條例與應用皆不符合國際人權法與國際標準中的和平集會規範。而其中三人，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及梁國雄，也面臨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控訴。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呼籲當局修正《公安條例》中的相關條款，以符合香港對國際人權法的義務。



## 1 台灣期待王光祿等釋憲案 展現國際人權法精神

司法院大法官於3月9日針對王光祿等釋憲案召開言詞辯論庭，數十個原住民族青年團體、地方團體及人權倡議NGO共同遞狀，提供意見書供大法官作釋憲參考。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長期遭受汙名，並受到不適當的法律限制。本次釋憲案對原住民族社會具重大影響，我們期待政府正視過往的歷史，讓釋憲案能彰顯國際人權法對原住民權利的保障。







5

### 好消息!2020寫信馬拉松 個案班斐敏獲釋

班斐敏 (Paing Phyto Min) 和其他兩位孔雀世代的成員在4月20日緬甸的大規模大赦中獲釋。然而，他們原先根本不該因和平進行諷刺劇表演而入獄——而他們已在牢房中度過兩年時光。儘管班斐敏和據報超過23,000名囚犯獲釋，緬甸軍方仍持續恣意逮捕並拘留針對政變發表批評的人士。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呼籲所有因出於政治動機的指控而被關在監獄裡的人，都必須立即獲得釋放。



6

### 日本首例司法判決出爐 邁向平等重要一步

北海道三對同性伴侶先前提起訴訟，針對政府不願修憲讓同性伴侶結婚，要求一百萬日圓賠償；3月17日，札幌地方法院做出判決，判政府「不承認同性婚姻」違憲，成為該國首例邁向婚姻平權的司法判決。國際特赦組織樂見判決，目前也發起全球連署，支持日本LGBTI族群的權利。



7

### 丹麥漫長修法之路： 非同意即強暴終獲通過

丹麥一直以來將強暴定義於「是否受到肢體暴力、威脅、脅迫，或受害者是否處於無力還擊」的情況。2020年12月17日，丹麥國會議員表決通過修法，決定將基於暴力才構成強暴的定義，改成缺乏同意的性行為即為強暴，這是女性權利的一項里程碑。我們將繼續改變丹麥社會的性別文化，扭轉法律體系專業人士的過時想法。



8

### 阿爾及利亞「人民運動」兩週年 社運人士持續遭當局壓制

阿爾及利亞「人民運動」(Hirak) 已兩週年。2019年12月，阿爾及利亞總統塔布納贏得總統大選，向全國承諾政府將「鞏固民主與法治，尊重人權」，並於2月18日下令釋放數十名示威者，37人獲釋。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呼籲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因表達個人意見或參與和平示威而被起訴、拘留的和平示威者、社運人士及記者，並撤銷針對他們的所有罪名。



## 幕後觀察



自左上角順時針：寫信馬拉松台北、台中、台南、花蓮場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一年一度的「寫信馬拉松」(Write for Rights) 已告一段落。2020年全球在疫情衝擊下，許多分會無法實地舉行活動，台灣有幸在嚴格的防疫生活中度過難關，使得台灣分會的實體活動仍能於年底順利舉行。儘管疫情籠罩，這個延續了幾十年的全球最大人權活動仍在國內外吸引許多關注人權的人們；而在台灣，我們與1000多名全台各級教師合作，創造了十萬多名學生參與的驚人成果；除此之外，我們也在台北、台中、台南、花蓮四地舉行了寫信馬拉松的專場活動，邀請並動員民眾和支持者一同參與，聲援人權受害者。

2020年，台北場有幸邀請到詹森淮、貝克小姐、楊舒雅、島嶼無風帶等演出者及講者；台中場邀請到吳音寧、吳志寧、鄭清華；台南場邀請到鄭竹梅、林生祥等；而花蓮場則邀請到地球公民基金會、以莉·高露等一同參與。在眾多夥伴的聲援與支持下，寫信活動增添了许多精彩的樂聲及講演知識，並吸引到超過500人的參與。即使在疫情衝擊下，參與台灣分會寫信馬拉松的支持者及行動次數仍持續上升，讓人看到台灣社會對人權關切的力量！

## 2020寫信馬拉松重要數據

全台共

# 118,650人

齊心助跑

1,000+ 人參與寫信派對  
其中 1,150+ 位教育工作者  
116,370+ 位學生  
達成 338,430 次行動次數

## 2021年人權日記與重要紀念日

一月  
**27**

國際大屠殺紀念日

一月  
**28**

數據保護日

二月  
**6**

國際殘割女性生殖器  
零容忍日

二月  
**20**

世界社會正義日

二月  
**21**

國際母語日

三月  
**1**

世界零歧視日

三月  
**8**

國際婦女節

三月  
**21**

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

三月  
**24**

國際嚴重侵犯人權行為  
真相權利和受害者尊嚴  
紀念日

三月  
**25**

國際奴隸制和  
跨大西洋奴隸貿易  
受害者國際紀念日

三月  
**25**

國際聲援被拘留者和  
失蹤人員團結日

四月  
**22**

世界地球日

## 編輯手記

### 秘書長的話

過完因為疫情而充滿各種變化的2020年，我們迎來了2021年，在疫情方面，我們看到全球疫苗分配的巨大貧富落差，我們雖然因為無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 而在資訊或疫苗取得上遇到刁難，但相較於許多國家封城、死亡人數激增、孩童無法上學、家暴數量激增等問題，台灣的情況算是非常幸運。

但是在亞太區域，我們看到泰國的人民上街、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被迫關閉、緬甸的國務資政翁山蘇姬被逮捕、和平示威人民遭到警察拿衝鋒槍暴力鎮壓；我們看到科技龍頭facebook、youtube協助越南政府箝制人民網路上的言論自由；我們看到香港國安法的演變越來越惡劣，47位民主派人士因參與初選而遭到逮捕。我們在農曆過年前夕，舉辦了一場為那些仍被關押在中國監獄的維權律師、人權捍衛者、台灣的李明哲祈福的活動。

在台灣，我們還是以能盡的一點棉薄之力，為其他國家的人權努力。我們看到在許多女權團體及人權團體的倡議施壓下，阿根廷的墮胎終於合法化，我們也收到來自阿根廷分會的感謝，台灣在這波全球連署中貢獻了數量不少的連署。我們看到2020年寫信馬拉松的個案之一，阿爾及利亞的記者卡利，在2021年2月獲得釋放；2020寫信馬拉松的個案，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權運動者，納斯瑪的兒子收到大家的信件也感動不已。

在進入2021年的開頭，我們期許台灣分會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及能動性，結合更多的青年及願意關注人權的朋友們，一起努力，共同為不論是台灣或是國際上的人權議題發聲。

我們今年將開辦台南辦公室，期待走出台北，把人權議題帶到南部，跟更多人產生共鳴迴響，促成更多討論及行動和改變。我們期待我們的腳步可以走得越來越遠，可以跟在地有更多連結，也可以與此同時把國際人權的角度帶入台灣。

今年我們依然發布全球人權報告、死刑報告，另發布針對台灣數位身分證的隱私權評估報告及人臉辨識報告。我們將針對更多議題，與在地的學者專家及社運組織產生連結及合作。人權不分國界，我們期待這句話可以在台灣真正被實現。也期待台灣可以展現我們的高度，作為這個區域的人權表率。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 彼得報編輯團隊


總編輯：王亭鈞, Ethan Wang  
協力作者：王亭鈞 (編譯)



# 平民遭受武裝衝突波及 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武裝衝突

2020年9月至11月，西亞高加索地區的兩個國家：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為爭奪納哥諾卡拉巴克地區（Nagorno-Karabakh）及周邊領土的控制權而發生了為期44天的衝突，兩國軍隊都在此期間進行了國際人道法所禁止的過度和無差別的攻擊。雙方在人口密集的平民區使用無差別攻擊武器，其中包含被國際禁用的集束炸彈，非法殺害了數十名平民、造成數百人受傷。

國際特赦組織於2020年11月和12月在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包括納哥諾卡拉巴克地區進行實地調查，記錄到兩國軍隊對遠離前線的平民區進行攻擊，這些地區通常似乎沒有任何軍事目標。對平民區的多次攻擊顯示這些行為並非偶然，而可能是向對方施壓恐嚇的蓄意戰略的一環。

 亞美尼亞部隊發射的一枚飛毛腿彈道導彈在亞塞拜然Ganja勝利公園對面的Rafibayli街炸死10名平民、摧毀數十間房屋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長期的民族與領土衝突

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對納哥諾卡拉巴克地區控制權的衝突，可以追溯到兩國從蘇聯正式獨立許久之前。在蘇聯時期，亞美尼亞人在納哥諾卡拉巴克自治區佔多數，當時自治區屬於亞塞拜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87年，納哥諾卡拉巴克地區的亞美尼亞居民要求將該地區從蘇維埃亞塞拜然移交給蘇維埃亞美尼亞，地區內外的族裔緊張關係迅速升級，導致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和其他族裔社群遭遇暴力、死亡、傷害和大規模流離失所。

1990年代，在蘇聯即將終結之際，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1994年達成停火協議時，亞美尼亞部隊已經完全控制了納哥諾卡拉巴克和周圍幾個亞塞拜然地區，維持軍事佔領的狀態。超過50萬亞塞拜然平民被迫離開這些領土上的家園，此後一直作為國內流離失所者生活在亞塞拜然的其他地區。

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部隊之間最近期的一次軍事交戰始於2020年9月27日，並於同年11月10日結束。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俄羅斯簽署了停火協議，而俄羅斯是停火協議的中間人。因為此協議，亞塞拜然政府重新控制其大部分國際公認的領土；但部分的納哥諾卡拉巴克地區，包括該地首府Stepanakert（亞塞拜然稱之為「Khankendi」），仍在亞美尼亞的有效控制之下。協議規定俄羅斯部隊在分隔雙方的接觸線沿線發揮維持和平的作用，並確保雙方能安全通過另一方控制的領土。數萬名亞美尼亞人逃離了他們在納哥諾卡拉巴克的家園，雖然有些人後來回到亞美尼亞部隊控制的部分地區，但許多人現在面臨長期流離失所的未來。兩個社群的流離失所者不可能在短期或甚至中期內大規模返回，因為這些地區布滿地雷，而且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過往家園的痕跡。

## 亞美尼亞部隊攻擊平民區的證據

此次衝突中的傷亡者多為士兵，共有5,000多人喪生。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當局都否認對平民地區發動無差別的攻擊和使用集束炸彈——儘管有無可辯駁的證據顯示雙方皆曾如此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亞美尼亞部隊對亞塞拜然城鎮和村莊進行的8次攻擊，共造成72名平民死亡。除了殺傷沒有直接參與敵對行動和不在軍事目標附近的平民外，亞美尼亞部隊的攻擊還摧毀或損壞了大量民宅和其他民用物體。例如在Terter，一個由34棟公寓大樓組成的定居點，供1990年代初從納哥諾卡拉巴克流離失所的家庭居住，其中至少有25棟公寓被擊中，8棟樓的屋頂被毀，數百棟其他公寓和行政大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其中一起攻擊發生在10月17日凌晨1點左右，亞美尼亞部隊對Ganja的Mukhtar Hajiyev居民區進行了攻擊，造成21名平民死亡、超過50人受傷、部分居民區被毀。亞塞拜然官方的國家排雷行動機構（ANAMA）的排雷人員確認，亞美尼亞部隊使用的武器是一枚飛毛腿B型彈道導彈。亞塞拜然政府發言人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據稱是亞美尼亞部隊攻擊過後的照片，其中有一枚飛毛腿B型飛彈的碎片。然而，Ganja實際上距離前線超過50公里。

Sudaba Asgarova的14歲女兒Nigar在此次攻擊中喪生，更殺死了許多親屬——她的父親、兄弟、姐妹和10個月大的女兒、16名鄰居。她告訴國際特赦組織：「我當時在俄羅斯當廚師，一年工作幾個月。（攻擊事件過後）親戚告訴我，我的父親被殺了。他們沒有告訴我，我的女兒和所有人都被殺了。同事們帶我去機場，將手機從我身邊拿走並交給另一位乘客，這樣我就無法從網路上發現我的家人發生了什麼事。當我回到家時，他們已經全部被埋葬了。她去世的隔天就是她15

歲生日。她是我唯一的孩子。她是我的全部。」

## 亞塞拜然部隊攻擊平民區的證據

國際特赦組織也記錄了亞塞拜然部隊對納哥諾卡拉巴克的城鎮和村莊進行的9次攻擊和對亞美尼亞的1次攻擊，共造成11名平民死亡。據實際掌管納哥諾卡拉巴克地區的當局表示，至少有52名亞美尼亞平民在衝突中喪生。其中一些攻擊使用了無差別攻擊的武器，如122mm「冰雹」火箭砲和國際禁用的集束炸彈。

若許多平民沒有離開該地區或躲進地下室，對納哥諾卡拉巴克城鎮和村莊的頻繁攻擊，本有可能造成更多的平民傷亡。亞塞拜然部隊的攻擊還摧毀了大量平民住宅和其他民用物體，包括教堂和市場。在該區首府 Stepanakert，數十棟房屋和公寓被不同程度地摧毀或損壞；事實上，在44天的衝突中，該市遭受多次攻擊，有時甚至一天多次。與該地區其他地方相同，亞塞拜然部隊對 Stepanakert 往往進行不符比例且/或無差別的攻擊。

其中一起攻擊發生在10月4日中午，亞塞拜然部隊發動一系列攻擊，造成至少4名平民死亡、數十人受傷，並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大片地區破壞了數十棟住宅和建築。受害者中有69歲的 Arkadi Lalalay，他被炸死時站在三樓公寓的陽台上——當日上午一枚火箭在該樓的花園裡爆炸，他被火箭的彈片擊中。

Arkadi Lalalay 的兒子 Naver 告訴國際特赦組織：「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的父母一直和其他居民一起住在大樓地下室的防空洞裡，並定期上樓使用浴室和廚房。那天早上，我父親上樓站在陽台上，一枚火箭在花園

裡爆炸。他當場被炸死，公寓很多地方都被炸毀，就像你看到的。住在樓上的一名身障女孩也被炸傷。」

## 兩國應避免平民再次遭受威脅並補償其損失

根據國際人權法，武裝衝突的各方有義務保護平民不受影響，並遵守禁止直接攻擊平民和民用物體以及禁止無差別和不符合比例攻擊的規定；尤其不能在平民稠密地區附近使用大面積的爆炸性武器，如火炮。儘管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此次的武裝衝突已暫時告一段落，但雙方針對平民區實施的攻擊卻遺留了諸多負面效應，需要長時間才能撫平平民所受到的傷痛。而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當局兩個主要責任者應盡最大努力彌補過失，國際社會也應採取相應行動監督二國。

首先，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當局應迅速、徹底、有效且公正地調查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從其武裝部隊成員中查明應負起責任者及高層指揮者，並在有充分的刑事責任證據時，在尊重公平審判標準的程序中將其繩之以法。在追究刑事責任的同時，二國當局也應關注因武裝衝突而流離失所的人民，並為他們能夠返回受衝突影響的家園創造出必要條件，包括重建被毀的房屋和民用基礎設施，以及為平民提供安全和適當的環境。而針對未來重建可能遇到的問題，二國也應建立機制，以有效監測各自人民、文化和宗教場所、私有財產，確保其擁有安全和人權的保障，並確保能得到適當補償並防止任何可能的破壞。在這個過程中，需考慮讓相關的區域及國際組織參與，讓其在執行以上事務時提供相關經驗、專業知識和公正監督。在戰後重建和補償之外，也應確保類似針對平民區的攻擊和違反國際法的武器使用情形不再出現。



↑  亞美尼亞軍隊在44天的衝突中向亞塞拜然 Terter 市發射的火箭殘骸 © Amnesty International





疫情期間的羅興亞人社區。

 Khachatran一家三口於2020年9月30日在MARTAKERT遇害的商店對面的一棟建築物的台階上，埋藏著亞塞拜然部隊發射的一枚「冰雹」火箭彈殘骸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人權焦點：表達自由權利

# 讓我們呼吸！ 越南政府的網路審查 與科技巨頭的共謀



國際特赦組織《讓我們呼吸！》報告的封面插圖，該報告調查了Facebook在越南的業務以及越南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 © Amnesty International

「我要呼籲Facebook停止打擊傳播政治相關內容的帳號。這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利。」人權捍衛者阮文莊 (Nguyen Van Trang) 告訴國際特赦組織，他在Facebook上發佈的批評越南政府的內容在2020年中被該公司刪除。與許多越南人權捍衛者一樣，阮文莊主要依靠他的社群媒體平台來分享與越南政治和人權有關的新聞和訊息，他的Facebook帳號有約8000名朋友和追蹤者，他管理的三個Facebook頁面則總共有超過100萬人追蹤。

「我已經對Facebook失去信心，不再那麼常發文了。試想，你花了多年經營你的Facebook帳號和貼文，寫下你對民主的熱情，結果Facebook簡單的一個舉動，就輕易抹去你數年來的努力。這真的讓我很氣餒。」阮文莊解釋。「我們被剝奪了表達意見的能力。我們接觸公眾的能力現在非常有限。」

另一位人權捍衛者和YouTuber An\* 也告訴國際特赦組織：「YouTube試圖阻止人們說真話，即使人們只是報導真相……這影響到社會中的每個人，包括人權受害者。」An\*向國際特赦組織描述科技公司在越南當局的要求下施加越來越多的限制，對越南的言論自由產生寒蟬效應，而這又對該國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層面產生重大影響。「這並不公平。它影響到在越南倡議民主和人權的人。現在我們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他們不應該限制表達真相的內容。科技公司一旦這樣做，只會淪為政府控制訊息和言論的工具。」她代表其他被壓迫的越南人權捍衛者發聲，向在越南經營的科技公司發出明確訊息：「讓我們呼吸！」

## 越南政府壓迫網路表達自由

越南如今是世界上最壓抑網路言論自由的國家之一。越南對社群媒體上政治言論的審查越發加劇，而這正是因為網路迅速的普及深刻地改變越南的社會形貌，為自由交流訊息和思想，包括人權和政治問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間。在越南嚴格審查所有形式的傳統出版物的情況下，網路已成為獨立新聞和訊息的重要來源，人們能藉其發表意見、表達觀點和進行政治辯論。


然而，雖然網路為越南人民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來表達和交流政治觀點，它也使用戶面臨更大的風險，即受到一心想要消除異議的當局的騷擾、恐嚇、肢體攻擊和起訴。近年來，越南當局意識到網路言論空間的重要性，加快壓制網路言論自由的步伐，除了施壓跨國科技公司以審查並刪除批評政府的言論之外，越南當局還使用各種方式來壓縮言論自由的空間，例如許多越南的人權捍衛者和社運人士可能遭受警方拘留、肢體暴力、來自網軍的威脅或精神霸凌等，而其家人的自由及安危也受到重大威脅。

越南憲法和越南已批准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皆保障言論自由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闡明，人們在線下享有的權利，在網路上同樣必須受到保障，各國應創造和維持一個「有利的網路環境」以利於享有人權。然而，越南《刑法》中卻有多項罪名，如第117條和第331條，授權當局起訴合法行使網路言論自由權的人。

近年，越南還加大了控制言論自由的力度。2018年起生效的2015年版《刑法》，恰逢越南網路使用量暴增的時期。而自該法生效以來，該法一直被系統性地應用在壓制網路言論。2018年，有30人因網路言論遭到指控和拘留，後來都遭定罪和監禁。2019年又有24人被指控和拘留，其中21人已被定罪，3人仍在審前拘留中。截至2020年11月，又有21人被捕，其中2人已被定罪，其餘仍在審前拘留中。

這些部落客、人權捍衛者和其他社運人士不僅不斷面臨恣意逮捕和起訴的威脅，他們還忍受著野蠻的肢體攻擊、陰險的監視和恐嚇、家庭成員被騷擾以及網路霸凌的威脅。這些法外手段有時是越南當局或越南共產黨 (CPV) 的代理人或支持者所為，但一般是由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員所為。對這種侵權和霸凌行為的補救和責任追究十分困難，甚至根本不存在——人權捍衛者在遭到毆打或騷擾後向當局提出申訴，很少得到認真對待。就我們所記錄到的案例而言，國際特赦組織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呈現警方進行了可信的調查，也沒有發現任何涉嫌侵犯人權捍衛者權利的加害者被繩之以法。

幾位國際特赦組織採訪的人權捍衛者表示，他們在拘留期間遭到警察毒打。另一些人則說，他們遭到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裝人員攻擊，並被打得昏迷不醒，而在一旁旁觀的警察卻沒有干預。許多人表示受到重傷，包括肋骨、鎖骨和手部骨折等。

↓  越南YouTuber和人權行動者An\*：「YouTube試圖阻止人們說真話，即使人們只是報導真相……他們不讓公眾知道真相」  
© Amnesty International





“I HAVE LOST FAITH IN

facebook

WE HAVE BEEN STRIPPED OF OUR  
ABILITY TO EXPRESS OUR  
OPINIONS. OUR ABILITY  
TO REACH THE PUBLIC  
IS NOW VERY LIMITED.”

*Nguyen Van Trang*  
Vietnamese activist.



越南的人權行動者阮文莊：  
「我已經對Facebook失去信心。我們被剝奪了表達意見的能力。我們接觸公眾的能力現在非常有限。」

© Amnesty International

除了利用代理人進行肢體威脅，越南當局還有利用網軍進行騷擾的情形。越南的「網軍」，稱為「47部隊」，是一個由一萬名國家維安人員組成的軍事單位，其任務是透過騷擾和恐嚇社群媒體上的人權捍衛者和社運人士，來「打擊網路上的錯誤觀點及扭曲資訊」。除此之外，還有一支主要由越南共產黨支持者志願組成的非正式團隊「Du Luan Vien」或「帶風向網軍」，進行類似行為。

這些政府資助的團體使在網路上表達批評觀點的人權捍衛者和個人受到死亡威脅和惡毒的精神霸凌，使一些社運人士處於恐懼生命安危的情況之中。另外，正如牛津網際網路研究院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所指出，越南的帶風向網軍也會發動大規模檢舉行動，濫用社群媒體公司提供的「檢舉」功能。在大規模檢舉行動中，大量用戶——通常是網軍——同時「檢舉」某個帳號或特定內容，目的是讓社群媒體公司以內容違反社群守則為由將其刪除或停用。

## 跨國科技公司共謀參與壓制表達自由

在越南當局擴大壓制言論自由的策略中，施壓跨國科技公司是其中一環。透過市場、法規甚至是私下的商業活動干擾，越南政府威脅Facebook和Google等公司配合其壓制言論自由的政策。

越南已成為跨國科技公司利潤豐厚的市場。據業內專家稱，按收入計算，它現在是Facebook和Google在東南亞市場最大的國家。2018年，Facebook在越南的收入接近10億美元——幾乎佔東南亞所有收入的三分之一。同期，Google在越南賺取了4.75億美元，主要是基於YouTube的廣告收入，這些驚人的獲利規模反映出，越南對於Facebook和Google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市場。然而，我們也必須問：進入這個市場的代價是什麼？

2020年4月21日，Facebook宣佈其在越南的內容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在此一政策下，其越來越遵守越南當局針對認定為批評國家的網路言論的壓制性審查。Facebook表示，越南政府施加強大壓力，用降低越南平台流量作為警告，因此才同意「更加」遵守越南政府的要求，協助審查「反政府」的貼文。Facebook的決定可能會在全球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世界上其他專制政府現在可能會試圖採取類似策略，迫使Facebook和其他科技公司限制網路言論。正如一位業界觀察人士所言：「Google和Facebook處理越南問題的方式已經提供線索，讓人們看到在專制政府的要求之下，它們是用此種方式保護用戶隱私和處理審查要求的。」Facebook的決定使得越南社群媒體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社群媒體平台曾經是該國擴大言論自由的希望，但卻正迅速淪為毫無人權的地帶，任何和平的異議或對越南政府的批評都有可能被審查；試圖發佈



此類內容的用戶面臨帳號被停權或以其他方式禁止進入平台的風險。在Facebook宣布迎合越南當局的審查要求後，Facebook於2020年11月發布了新一期透明度報告，讓人得以一瞥此一轉變的規模。根據報告，Facebook以越南法律為根據，限制發布內容的比例提高了983%。然而，無論在哪裡經營，包含Facebook和Google在內的企業都有責任尊重人權。根據國際人權標準，無論當地是否存在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Facebook和Google在全球範圍內作出限制內容的決定時都應尊重言論自由。雖然企業有時會反應，當地現實和國際法標準所規定之義務有所衝突，實行上帶來困難，企業仍應以《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為準。該原則指出：「尊重人權的責任是所有工商企業無論在何處經營時都應遵守的全球行為標準。這種責任與國家履行自身人權義務的能力和/或意願無關，且不減少這些義務。」

## 網路表達自由應獲充分保障

正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所指出：「意見自由及言論自由是個人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些自由在任何社會都是必要的……言論自由是實現透明及課責原則的必要條件，而這些原則又是增進及保護人權的基礎。」

越南對網路表達自由權的系統性壓迫，需要立即採取補救措施。越南當局必須提供給人權捍衛者和所有在網路上和平行使人權者一個安全和有利的環境。當局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僅因和平行使人權而被關押的良心犯，並保護人權捍衛者、社運人士和其他在網路上表達自己意見的人不受肢體攻擊、威脅和網路霸凌。此外，越南當局還必須對所有此類侵權的指控進行徹底、獨立、透明和有效的調查，並將應負起責任的人繩之以法。

包括Facebook和Google在內的科技公司則必須立即全面審視其內容政策，以確保這些政策堅定符合國際人權標準。改革後的政策必須符合透明和究責的最高標準，並將用戶和民間社會的有效參與包含其中。當科技公司嘗試抵制越南當局和其他國家政府的壓制性審查要求，重新制定的政策將為其提供堅實的立足點。

除了越南政府及跨國科技公司外，美國政府也必須扮演積極角色。美國政府應立即採取措施，依法管理在越南註冊的科技公司，確保他們的全球業務符合《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並確保因美國企業的行為而遭受人權侵犯的個人能夠獲得有效的補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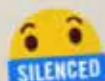
↓  Facebook協助越南政府進行網路審查 ©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POSED!

# LET US BREATHE


How **facebook**  is helping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censor people online.



人權焦點：移工權利、勞工權利

# 承辦世界盃的承諾 卡達應改善其移工政策



 卡達的建築工人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即將拉開帷幕，全世界的目光屆時將聚焦主辦國卡達，這是世界級足球賽事首次在中東地區舉辦。自卡達成功申辦該賽事以來的十年間，數百萬來自亞洲和非洲的移民來到這個國家工作。無論是建築業、接待服務業還是家政業，這些移工為該國的經濟及發展做出巨大貢獻；沒有他們，世界盃就不可能舉辦。然而，國際特赦組織及其他組織也記錄到在這些年期間，成千上萬的移工受到嚴重剝削與虐待，有時甚至構成強迫勞動。而這樣的現象是由卡達現行的勞動制度所促成。

2017年，卡達宣佈與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建立合作關係，宣示使其勞動法律及實務層面與國際標準接軌；外界當時滿懷期待世界盃也許能為該國工人的權利帶來正面影響。然而，隨著開幕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勞動改革的承諾是否與現實相符？

2020年，卡達當局宣佈進行重大改革，促進行動自由並引入新的最低工資標準。然而，近年來其他改革實施和執行的狀況不力，使數以千計的工人仍受到肆無忌憚的雇主擺布，這些雇主可以虐待工人而逍遙法外。如今，儘管法律框架有所改善，這些移民卻仍然經常面臨工資被拖欠或不支付、工時過長的問題，且難以獲得法律救助。COVID-19疫情的影響也給雇主和員工帶來新的壓力。對移工來說，這只會加劇他們的弱勢處境，包括因高額的招募相關費用而欠下沉重債務、行動被限制、遭受虐待而嘗試獲得有效救濟時面臨阻礙。





## 「出境許可證」制度限制行動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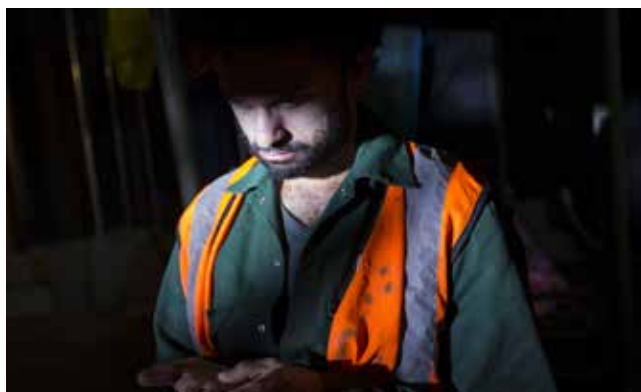
在過去十年間，卡達移工面臨著稱作「卡法拉制」( Kafala system ) 的制度剝削。該制度的其中一項規定要求幾乎所有移工皆須從雇主處獲得「出境許可證」( Exit Permit ) 方可出境，此一規定嚴重限制了移工們的移動自由，並創造了雇主得以苛刻對待移工的不平等條件。2018年9月，卡達宣佈將取消《勞動法》所涵蓋的移工出境許可要求，並在2020年1月將適用範圍延伸至包含家政移工在內的幾類勞動者。然而，若經行政發展、勞動和社會事務部 (MADLSA, 簡稱「勞動部」) 批准，雇主仍可對其所僱用的勞動力中最高5%的人，因其工作性質要求其須獲得出境許可方可出境。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ILO) 關於國際勞工組織-卡達夥伴關係的2020年進度報告，截至2020年8月，卡達勞動部已批准了42,171項保留移工出境許可證的請求。而家政移工更需在離開前72小時親自「通知」雇主。

最重要的是，決策中沒有提到雇主違反其規定的任何法律後果，對濫權行為沒有任何威懾力。然而，未將其離境情況通知雇主的家政工卻可因紀律原因被解雇，並被剝奪其應得的經濟利益、禁止再次進入卡達。此外，如果不進行更多的改革並實施適當究責機制，單單取消出境許可的改革措施很有可能反而會使更多的雇主沒收護照，並提出惡意和毫無根據的指控。理論上，取消出境許可是正確的一步，使大多數移工恢復了行動自由，能夠在沒有任何要求的情況下離開卡達。但是，需要監督和究責機制來確保改革得到充分和適當的實行，以阻止濫用職權的雇主採取報復措施來控制工人的行動能力。

## 「無異議證明」制度給予雇主過大權力

「卡法拉制」除了要求「出境許可證」，還規定絕大部分移工在約聘到期前，未獲雇主提供「無異議證明」(No-Objection Certificate) 不得主動申請調職。這讓移工的法律地位牢牢控制於雇主手中，此一臭名昭著的規定長期受到國際撻伐。2020年8月，卡達做出新制改革，允許移工在滿足某些條件 (包括完成試用期和送交書面通知) 後無需雇主許可即可更換工作，成為該地區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根據修訂《勞動法》某些條款的2020年第18號法律和修訂《擔保法》的2020年第19號法律，所有移工在最長6個月的試用期結束後可以更換雇主，但必須送交書面通知。移工在工作未滿兩年、工作滿兩年等條件下更換工作的規定也有相應的調整。

雖然現在評估這些改革對移工更換工作能力的影響還為時過早，但協助卡達移工的組織告訴國際特赦組織，一些移工發現由於語言障礙或無法使用智慧型手機，操作線上申請更換工作的流程會碰到困難。勞動部和國際勞工組織正努力宣傳新的修正案，並發布一份操作指南，



↑  卡達移工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向雇主和員工解釋線上轉職的流程。然而，一些雇主仍要求新僱用的工人向他們提供「無異議證明」，儘管這顯然已不再是合法要求。甚至還有一些雇主在得知移工打算更換工作時，取消他們的簽證或污蔑其違法潛逃，從而破壞其轉職；還有些移工 (尤其是家政工) 的護照和身份證遭雇主沒收。因此，當局須迅速辨明漏洞、採取措施，以確保上述改革得以施行。

然而，儘管有對「出境許可證」及「無異議證明」的改革，卡達的移工與其雇主仍在法律上緊密連結：雇主從移工進入該國的那一刻起，在整個就業期間都充當後者的官方「擔保人」(kafeel)。根據《擔保法》，移工自己不能申請或更新其居留證，而要由擔保人來做這件事。因此，雇主仍然擁有取消移工居留證的合法權利，或對離開工作崗位的移工提出「潛逃」的指控，從而使移工失去留在卡達的權利，並面臨逮捕和驅逐出境。這種制度使有利於雇主的權力不平等持續留存，並增加了虐待勞工的風險。

## 弱勢的社會地位使改革難以普及到移工身上

除此之外，薪資遭到積欠甚至不支付則是移工經常面臨的另一大痛

苦。這不僅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水準，更使他們陷入被虐待和剝削的循環。對於許多藉高利貸支付非法高昂招聘費用以確保能在卡達工作的工人而言，情況尤其如此。這些費用產生的債務使工人處於非常不穩定的境地，在最嚴重的情況下，使移工面臨強迫勞動的風險。政府已試圖著手解決工資問題，包括加強工資保護體系、營運工人支持和保險基金，並對違反《勞動法》的雇主實行更嚴厲的處罰。然而迄今為止，這些措施尚未終結工資積欠或不支付的現象。


而移工在法律上及經濟上的弱勢地位相互影響，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審查其在工作場所中享有和平集會及結社自由權利的狀況時，就指出：「低工資移工面臨嚴重的經濟剝削、社會排斥和政治權利剝奪。他們的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往往被剝奪，通常是出於他們的非正規身份，或者由於法律管道中的結構性障礙，系統性地剝奪工人的權利……在目的地國，他們的工資往往很低或根本拿不到工資。他們在不安全和不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下工作，並遭受性別暴力……移工已成為大量可支配且低廉的勞動力，他們沒有獲得救濟或實際機會，無法集體談判以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


## 近期的法律改革仍須有效執行才能保障人權

自2014年以來，國際足球總會和負責規劃和交付世界盃基礎設施的卡達機構——交付和遺產最高委員會（簡稱「最高委員會」）推出了一系列舉措，旨在提供更好的保障給為世界盃作出貢獻的人員。這些舉措包含國際足總的人權政策、國際足總2022年卡達世界盃可持續發展戰

略，以及最高委員會工人福利標準。如今，有超過2萬多工人專門從事由最高委員會所監督的工作項目。這些標準所要求的更嚴格的勞動保護措施應使他們受益，包括及時支付工資和禁止強迫勞動等。隨著賽事籌備工作重點從建設轉向服務，國際足總和最高委員會開始將《工人福利標準》的範圍擴大到接待服務業的承包商和供應商。

這些標準改善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促進了經濟發展。然而，這些標準並沒有得到普遍尊重。國際特赦組織最近的調查也顯示，國際足總和最高委員會未能確保執行其關鍵保護措施，甚至使世界盃的工作人員也面臨被剝削的風險。卡達近期的法律改革為移工，尤其是被困在惡劣工作環境中的移工帶來希望。但是，為了使這些改革帶來必要的變化，必須同時建立嚴格和有效的監測和究責機制，以確保這些改革充分執行，並進一步改變一些關鍵領域。最後，卡達需要對侵犯移工權利的雇主採取嚴肅的行動。追究勞工虐待的責任仍然是對抗虐待的最關鍵的威懾力量之一。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充分執行法律、規定並施以懲罰，使虐待者知道他們將為其行為承擔後果。這反過來將發出一個強烈的訊息，即不再容忍侵犯勞動權利及相關犯罪。這對於保護面臨極為嚴重的虐待和剝削的家政工尤為重要。

←  一名印尼家事移工實習生在一家私人的家事工培訓和教育中心使用吸塵器進行練習 ©ReutersBeawiharta

↓  卡達移工的住宿環境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集會自由權利蒙上陰影 智利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

2019年10月中旬起，智利發生了一系列事件。起初是學生發起的一連串示威活動，反對首都地區公共交通費用的漲價。隨後新一波示威爆發，並迅速蔓延至整個國家。這種大規模的不滿情緒要求更大程度的平等、尊嚴和社會及經濟權利的保障，例如獲得體面的退休金、住房、教育和健保的權利。







智利總統皮涅拉 (Sebastián Piñera) 頒布緊急狀態作為回應，並在該國一些地區部署為期10天的武裝部隊。他們與智利武警 (the Carabineros de Chile) 展開聯合行動維持治安。

然而，這項措施不但沒有緩和情況，反而更加激怒示威者。武裝部隊 (其職能不包含維持示威中的公共秩序) 被控施以許多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他們多次對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器，並在示威活動中殺害三人，其中一人被槍殺。智利武警則在許多情況下，不僅沒有協助維持示威活動的秩序，也沒有適當處理暴力事件，反而使數千人受傷，其中數百人傷勢嚴重。

雖然智利過去有許多警察侵犯人權的記錄，但從2019年10月開始發生的國家暴力事件則是民主政府時期前所未有的。執法人員侵犯人身安全的行為十分普遍，而且由於警察是負責維持公共秩序的機構，因此需要採取深刻的結構性改革，以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 示威者要求改善社會與經濟權利

智利自1990年皮諾契特 (Pinochet) 領導的威權軍事政權結束並恢復民主以來，在制度、經濟和社會層面上取得了重大進步。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的數據，智利的貧困率遠低於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而且該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是拉丁美洲中最好的。1990年至2015年期間的智利，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從68%降至11.7%，根據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的研究，智利是該地區在社會政策方面人均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然而，儘管智利是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之一，在不平等方面卻排名中間，而且財富高度集中。2017年，50%的家庭只佔有全國2.1%的淨財富，而最富有的10%家庭卻佔到66.5%，金字塔頂端的1%的家庭佔到26.5%，這種社會經濟不平等體現在收入、資本獲取和就業方面，並對其他權利產生負面影響，如受教育、政治參與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權利。例如，2015年，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SCR Committee) 對智利《憲法》中的一些權利缺乏認可表示關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特別提到在以下權利方面缺乏進展：同工同酬、基本社會保障、適當住房權、打擊社會隔離、獲得安全飲用水和衛生服務 (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採掘業對水的過度和非永續的利用、低收入者獲得健保服務，以及公共教育品質等。

2019年底，智利全國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從10月7日開始，該國首都聖地牙哥的學生發起「大規模逃票」運動。這是為了回應前一天宣佈的聖地牙哥等地公車、捷運和郊區火車的票價上漲。10天後，成

千上萬人加入示威活動，聖地牙哥數十個捷運站的基礎設施被毀，並被放火焚燒，而維安部隊成員、學生和乘客之間則發生衝突。

10月18日，智利主要的電力公司大樓發生火災，皮涅拉總統下令在首都地區實行緊急狀態。該法令允許限制行動和集會自由，並規定武裝部隊可以執行公共秩序職能。然而，隨著示威和暴力事件在全國蔓延，不同地區也發佈持續5至9天的緊急狀態法令。

## 智利警方過度使用武力

隨後幾天，全國各地發生了大規模示威和騷亂，包括搶劫和幾起火災，大多發生在超市。在這種情況下，人權侵害事件急劇增加，例如智利武警和軍方發射子彈和鉛彈 (由金屬及橡膠合金製成)，造成了多起嚴重的眼部損傷。

雖然智利過去有許多武警侵犯人權的記錄，但在10月18日之後，人權侵害的程度達到了民主政府治理下前所未有的水平。10月20日，皮涅拉總統宣稱他是在「與一個強大的、無情的敵人作戰。這個敵人不尊重任何東西或任何人，而且即使造成人命損失還是會做出無限制的暴力和犯罪行為，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造成最大傷害。」

同一天，智利醫學協會 (Colegio Médico de Chile) 通報了第一起眼睛受傷的事件。此外，26歲的羅瑪里奧·韋洛茲 (Romario Veloz) 在參加遊行時遭開槍射殺，據報開槍者為軍方人員。另有數人死亡，大多數是在搶劫和火災的背景下發生的。

國際人權標準明定，執法人員在維持示威秩序時，武力必須是最後的手段，並應遵循合法性、必要性、比例原則和問責性。在不對第三方生命或人身安全構成具體威脅的情況下，執法人員為維持秩序而使用致命或可能致命的武力將被視為過度使用武力。武力使用必須與所追求的合法目標相符，並以上述原則為基礎。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裡，智利警方不僅過度使用武力，更蓄意造成示威者的痛苦。這種廣泛的傷害，在許多情況下對倖存者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後果。

在國際特赦組織所追蹤的一個半月內，根據智利衛生部的統計資料，因抗爭活動期間發生的事件，其中一所公立醫院有超過12,500多人接受緊急治療。在同一時期，則有2300名警察受傷。而據國家人權研究所 (Instituto Na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INDH)，至少有347人眼睛受傷，主因是被子彈擊中。另外，總檢察長辦公室登記了5,558名暴力的受害者，其中1,938人被槍彈擊傷，674人受重傷，其中285人為眼睛受傷。在受害者中，有834名兒童和青少年。在所有投訴中，有4,170件針對智利武警成員。除此之外，總檢察長辦公室還登記了246名性暴力受害者，其中6人涉及用物體進行性插入，2人涉及強暴，其中1人被多次強暴。而針對酷刑則進行了134次調查，對非法脅迫 (相當於虐待) 進行了4,158次調查。




## 智利當局應進行就責並改革其武警制度

2019年示威活動的前一個半月，武警廣泛地侵犯示威者人權。因此，智利檢察總長辦公室應繼續調查，並特別關注策略和行動指揮官的責任，他們作為責任擔保人卻默許或准許侵犯人權的行為一再發生。司法部門也應對所有可能的責任者提起訴訟，以確保受害者及其家屬能夠獲得正義。

除此之外，國際特赦組織也建議對智利武警進行結構性改革。此一建議也符合智利參議院安全委員會在2019年年底提出的議案。當局需要加強對國家警察的控制，並需要進行緊急改革，以確保其完全遵守國際人權法。最後，國際特赦組織還認為，2019年11月商定的新憲法起草進程是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可以解決引發示威的關鍵性社會權利問題。智利憲法未能充分保障人權，尤其是社會權利。如不進行這些結構性改革以保障權利，克服健康、教育、社會保障和住房等權利方面的差距和不平等，智利的人權危機將繼續存在。

未來的制憲會議，不論是100%民選還是混合制（50%民選，50%由議會代表組成），都必須確保民間社會和公民的代表性和實質參與，包括市政當局、民間組織、區域議會和人權捍衛者等。行政和立法機關應仔細考慮歷史上面臨邊緣化、排斥和歧視等經驗的群體的配套措施。

↓  智利大學生古斯塔沃·加蒂卡於2019年11月一場示威遊行中，被警方開槍擊中雙眼，成為整場運動中第一位雙眼失明者  
©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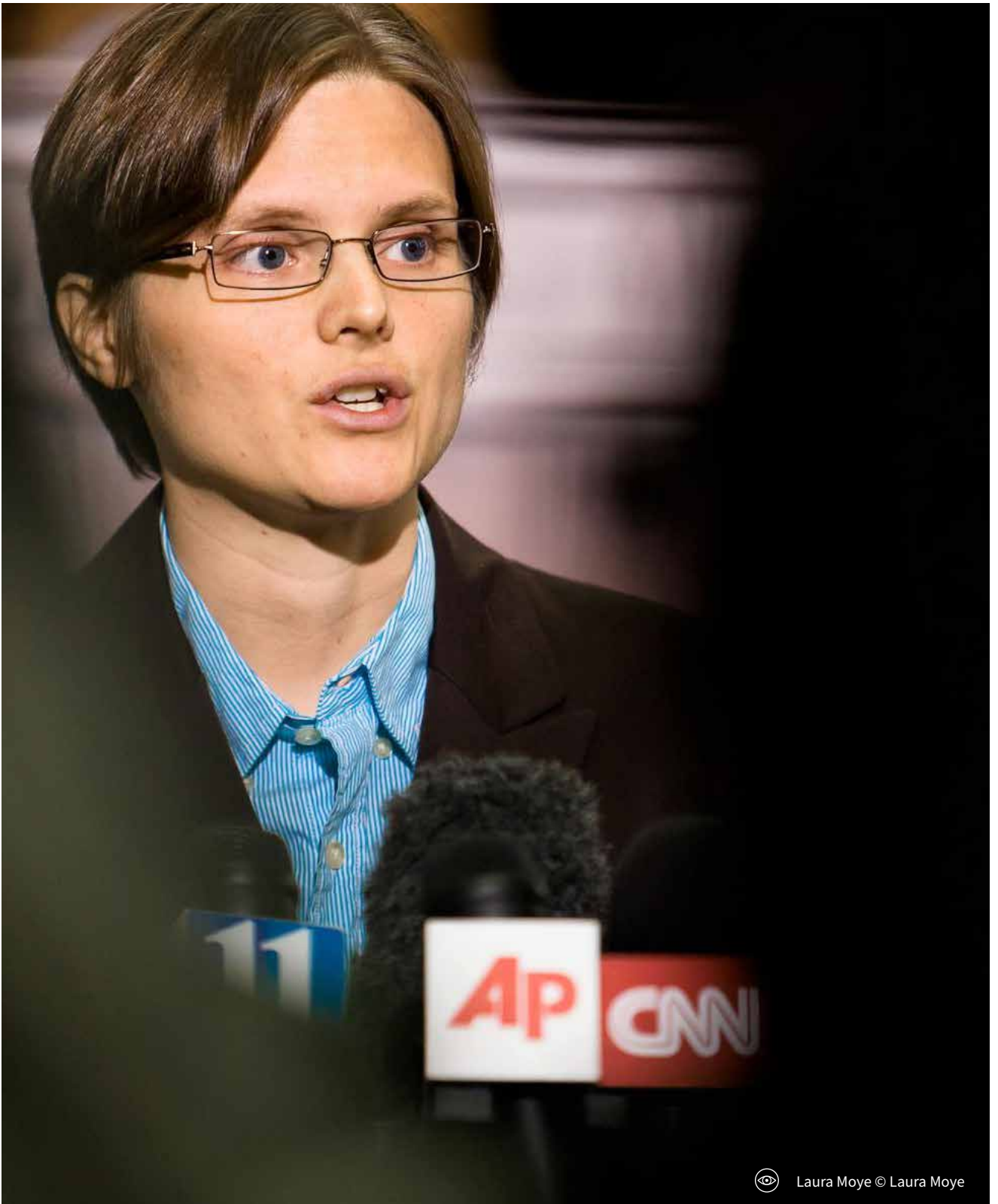
# 認識國際特赦組織的行動者— Laura Moye


2020年10月底，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租借了一台花車，並邀請到許多人權夥伴上車演講，穿梭在台灣同志遊行的隊伍中。其中，一位講者以英文積極地與觀眾互動，她是來自美國的Laura Moye，同時也是一名長達幾十年的國際特赦組織行動者。

Laura跟我們分享，她的家庭背景也許是她最早關心人權的原因之一。身為傳教士的父母擁有強烈的宗教信仰，從小就教導她關注他人的福祉以及奉獻他人的價值觀：「我深深相信，我們生活在這地球是為了某些原因，是為了每個人的利益，保障每個人的尊嚴及生活。」在她上大學以前所成長的城市香港，她第一次接觸到國際特赦組織。她加入當時英國學校老師創辦的校內國際特赦組織小組，學習並倡議人權，並感受到身為一名青年能夠做出一些改變。除此之外，Laura還說，她很喜歡香港這樣的城市，有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人，人權卻可以作為一種「共通語言」，成為人與人之間團結起來的工具。這讓她認識到人權能夠不分國籍、種族、性別的界線，成為人們交流的媒介。回到美國就讀大學後，Laura創立了她所在校園的第一個國際特赦組織小組，並在整個大學期間，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志工，全心投入的程度甚至到每次與朋友的聚餐都在談論人權，使得朋友們開玩笑地要她不要再談論人權了！她隨後跟美國分會南方區域辦公室取得聯繫，先是成為區域協調的學生代表，協助該區的小組經營，而後更參與全國學生大會、協助培訓、實習，並在畢業後加入國際特赦組織成為正式員工，幫忙學生小組的發展。Laura笑笑地說，其實一開始，她甚至不







 Laura Moyer © Laura Moyer

知道有人能夠因為從事人權工作而獲得薪水。會成為正職員工完全是因為長期積極參與而順水推舟的結果。

但無心插柳，卻成為5個職位、2個辦公室、長達15年的國際特赦組織工作生涯。一開始，Laura延續著協助當地小組發展的工作，與當時約將近200個小組合作，收發訊息並解答小組的疑難雜症。後來，她成為該區域負責小組培訓的主任，每年籌辦南方的區域大會，為行動者們舉辦週末兩天的工作坊，並讓他們學習帶領小組的技能。Laura回顧過去工作所造成的改變，十分欣慰地說，許多行動者能夠將在國際特赦組織學到的事情應用到他們各自未來的生涯當中，有一位投身以低收入家庭學生為主的學校的行動者便是如此。

除了動員並培訓行動者外，Laura曾深入救援的一個人權個案也令她印象深刻。在南方區域辦公室及華盛頓特區辦公室，Laura都曾擔任廢除死刑的相關倡議職位。當時她所在的喬治亞州，有一名非裔死刑犯Troy Davis，他被控射殺一名白人警員，卻有強烈證據顯示非他所為。起出這個案子很少人關注，但經由不斷地倡議，以及各個NGO團體、大學教授、各級老師或外國機構的團結互助下，為Troy Davis發起的遊行

集會從2、30人增加到2、3000人，同時還蒐集到來自全球超過百萬人的連署。Troy Davis最後仍被執行死刑，但在國際特赦組織等許多行動者的努力下，死刑執行曾被暫緩長達五年的時間，而最難能可貴的是，儘管廢除死刑的立場曾讓國際特赦組織在美國南方的活動不受歡迎，但有許多人在這個過程裡改變了原先的想法，並因此關注司法正義、種族平等、死刑等議題。

當我們問到關於對世界人權的展望的問題時，Laura說，過去在國際外交的場合經常能夠看到人權議題，這幾年卻似乎沈寂了下來。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隨著全球化，人權的概念似乎又傳播得更為廣泛，「世界公民」的概念被加入到許多國家的正式教育課程當中。面對這樣的現狀，Laura期許國際特赦組織能夠繼續保持鋒利性，並記得國際特赦組織能夠貢獻於人權的特殊之處，那就是重視且培育新的行動者，並將他們帶入人權運動中。就如同當初Laura剛開始接觸國際特赦組織，因為學生小組所點燃的一絲光亮，因此走入數十年不間斷的人權工作。



↑ 探視Troy Davis。自後排左一依序是英國樂團「基音」鼓手Richard Hughes、Troy Davis、英國國會議員Allistair Carmichael、Laura Moye，自前排左一依序是Troy的母親Virginia Davis、Troy的姊姊Martina Correia、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廢除死刑倡議主任Kim Manning-Cooper © Laura Moye



**“黑暗無法讓我們驅逐黑暗，唯有光明可以。仇恨無法泯除仇恨，唯有「愛」才可以。”**

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